

桐城文化中“教化”思想的实践智慧

张元

(淮海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挖掘桐城文化中的“教化”思想,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营养因子。分析了桐城文化中的“教化”思想,认为治国之本在于治民,治民之本在于治心,良善政令不如善教得民之多。具体表现为兴办教育,振兴文教,督学教谕,倡议“教化”,以“文”化人,陶冶“性灵”,教化民众,以“德”谋“得”等。促使民众懂礼义、知廉耻、尚道德,形成一种持久稳定的精神意识和行为习惯,以实现桐城文化中的教民、化民和移风易俗的民本思想。

关键词:桐城文化;教化思想;化民“性灵”

中图分类号:G112;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7)02-0082-05

教化百姓是历代民本思想家看重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统治者可通过教化手段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宣传政策、法规,让百姓知礼明耻,以达到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稳定统治秩序之目的。所谓教化民众,就是使民众成为儒家思想所需要的民,在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上合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桐城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衍变沉淀而成的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之一,是明清时期出现在安徽省桐城县境内的具有典型性、独特性及很高学术价值的文化现象的总和。桐城传统士大夫,承儒学之教养,以淑世为志节,志在匡世安民,献身家国,则一切吏治政术之典章,民生疾苦之因由,国家处境之实况,均须详加考察,洞悉原委,故桐城文人士大夫于儒家经典之外,又须在世俗践履中获取阅历及充分知识与深刻理解,于是上自朝政典制,下至小民生计,无不究心考察,审计得失。率其出于司徒之官,以化民导治为天职,或出为官师,以亲民治事,既已为民兴利除害,又为国报效辛劳。行有余力则专心学文,以从政施治之余力助文教之推广。”^[1]桐城文人士大夫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强大,从而滋生敬畏民众、教化民众之心,他们强

调教民的重要性,诸多桐城仕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之时,便退则任教。

一、兴办教育,振兴文教

有清一代,桐城许多有识之士秉承“穷不丢书”的优良传统,虽身在异乡,却努力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或为官,或授徒,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建起为数众多的书院。如方宗诚在任枣阳县令时创办了枣阳书院,方正瑗在任潼商道时创办了关西书院等。在桐城本邑也建起了毓秀书院、培文书院、天城书院、白鹤峰书院、丰乐书院和桐乡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桐城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模式,其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书院的倡导创办者或为官府,或为私人,致其管理制度有不同于其他行政机构的特点。因此,书院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文人学者们研究学问、探讨思想的相对自由的场所,由于有众多名儒讲学其间,这往往能吸引众多的弟子随其求学问道,故书院能成为区域文化的中心与学术思想派别的发源地。清代的书院由于受到政府的强力控制,致其日益沦为封

收稿日期:2016-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3AZD0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资助项目“网络社会的现代性困境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7M611233);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大学生网络道德规范与教育对策研究”(项目编号:C-c/2016/01/07)。

作者简介:张元(1983-),男,安徽桐城人,副教授,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建科举制度的附庸。而“坚守程朱理学，善以古文为时文的桐城文派恰好与清代书院的这种变化相协调，由此，书院遂成为适宜于桐城文派学人讲学传道、传承学术的场所。方东树就曾强调国家、朝廷和执政者应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他提倡重视礼教，提倡以礼治民，以教化民，通过礼教和书院讲学传道来教育和感化民众，转移世俗民风。”^[2]而桐城文派正是得益于借助书院教学这种传统教育方式使其迅速突破区域的限制而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派别。

在乾隆三十九年秋(1774)，姚鼐就正式决定从京都学坛四库全书馆和官场告退，旋即到江南四处云游讲学。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嘉庆二十年(1815)间姚鼐先后历主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达四十余年之久。对此，姚莹在《姚惜抱行状》中叙道：“(姚鼐)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颖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士，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3]姚鼐在其时讲学的社会影响之大于此亦可见一斑。

桐城文化的发达，无疑促进了桐城地方文教的兴盛乃至周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以戴名世、姚鼐、刘大魁、方东树、刘开、戴钧衡、吴汝纶、王灼、朱雅、李雅、马宗琰、江有兰、姚永概等为代表的桐城籍的重要作家学者，先后在扬州、南京、安庆、徽州、庐州、亳州、宿松、廉州、韶州、黟县、东流、崇文、金坛、合肥、河北保定等地的书院讲学传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才俊学人。如刘大魁辗转讲学于敬敷、新安、问政书院，晚年任黟县教谕；姚鼐先后历主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等处主讲席达四十余年之久；方东树历主海门、韶阳、庐阳、亳州、宿州、泖湖、松滋、东山书院；张裕钊、吴汝纶主讲莲池书院；吕璜主讲桂林秀峰书院等。主讲书院的益处就在于学人能够发现人才、启迪后进，如在清朝久负盛名的“姚门四大弟子”都是姚鼐在书院讲学时所发现并予以大力栽培的，姚莹从姚鼐问学于安庆敬敷书院，方东树、梅曾亮、管同从姚鼐问学于南京钟山书院。

桐城文化中的此种教民思想主要是通过桐城学人主讲书院、任县学教谕和创建书院等途径传播到

全国各地，通过到民间走教书育人的下层路线以实现桐城文化中的教民、化民和移风易俗的民本思想理念。桐城派人士先后在书院里授徒讲学，既有利于扩大桐城派的影响，也可以践履以民为本、泽及斯民、教化民众的思想主张，且能够以其思想理论影响前来求学的年轻学子，这些学子今后或出仕，或教学，遂将桐城文化中的这种泽及斯民的民本思想扩展和传播到全国，从而产生了意义深远和规模宏大的影响。

二、督学教谕，倡议“教化”

桐城文人士大夫极为重视在各地开设学校，积极兴办教育，督学教谕，以古代的圣贤思想教导民众建立正确的合乎人伦规范的道德关系和行为准则。桐城先贤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治民，而治民的根本在于治心，良善的政令不如善教得民之多，良好的教育比好的政令更能得到民心。因此，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仅要求统治者要在政治上重民情民意、经济上重民生民利，还应该在思想上教民育民，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的君主和政治家们历来就自诩其既是民众政治上的管理者，又是思想上的教导者，即所谓的君师合一、圣王合一，这种君师一体思想在我国古代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而中国古代政治主流的儒家思想亦把君主视为政治上的统帅和思想上的导引者，这就要求统治者提高自身的知识道德等多方面的修养，以教化民众为大务，依据自身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并以其教化、引领和影响民众，由近及远地将伦理道德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此种使广大民众亲承受教的思想亦即古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广施仁爱的过程，从而使统治者获得广大民众在心理上形成合理的王位统治的共识并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级各类学校系统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社会化教化机制中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高级学校系统如太学、州(府)县学等，民间的学校系统则有大量存在的各种书院和各类蒙学，它们既构成了组织严密的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驯化的学校教育系统，又承担着社会的文化教化职责。朱元璋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4]正是有如此严密的学校组织系统，才使得儒家思想文化在民间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教化思想基本上是伦理的或者是政治的，其旨趣也在于社

会个体之德行教养和教民化俗之功,有着强烈的巩固阶级统治的伦理政治诉求。“文化”的“化”是动词,“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5]《管子·七法》云:“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教成于上而易俗于下谓之化”。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化”是对广大民众的精神意识及其生活行为习惯的一种有形手段和无形默化相结合的影响、渗透和转变的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是为成就个体之德。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教化”被认为是培养人类最高的精神品质的活动。黑格尔认为:“教化”是社会个体“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他指出:“个体的教化乃是实体本身的本质环节,即是说,教化乃是实体的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或者说,是实体的简单的灵魂,而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在存在才得以成为被承认的东西,成为特定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6]关于“教化”,伽达默尔指出:“它最初是在中世纪神秘主义中诞生,以后被巴洛克神秘主义所继承;再后演变成由克罗勃斯托克的《救世主》而来的主宰了整个时代的宗教上的唯灵论;最后这个词在赫尔德那里成了‘达到人性之完满教化’这个基本概念。”^[7]他认为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达到人性之完满教化的精神存在。由此可见,在西方的思想话语系统中,“教化”是指一种对人的思想精神进行培育,旨在使其精神世界发生深刻转变,继而使其形成一种持续稳定的精神意识和行为习惯,并由此达至一种人性之完满的驯化活动。

桐城文人士大夫为践行儒家文化的社会化教化机制,多走下层路线去地方任县学教谕,力图革制创新。如刘大魁、王灼、朱雅、李雅、马宗琯、江有兰、姚永概就曾先后担任黟县、东流、崇文、金坛、合肥、休宁、太平等县教谕,桐城张氏接连出任四世江苏学政、六代翰林。方式济之子方观承官直隶总督时,对书院的建设和发展极为重视,其本人也经常主持书院的考试,因此,他传播桐城文化中的文教思想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这与桐城古文学派能在莲池书院扎根发展应该是有因果关系的。

吴汝纶在 1881 年出任直隶冀州知州时锐意兴学,他凭借私交聘请到当时的著名学者如范当世、

贺涛等主讲冀州信都书院,使冀州及其此前担任州官的深州在他的有力推动下,文教事业成就斐然。为实现他革新创制的督学目标,吴汝纶于 1889 年 2 月正式辞去冀州知州之职,出任莲池书院山长。莲池书院自 1733 年创办伊始就受到清廷的重视,仅乾隆皇帝就曾三次驾临书院亲视学生课业。在任莲池山长伊始,吴汝纶就对书院存在的一些积弊进行了大胆改革。首先在保证生源质量的前提下扩大招生规模,凡通过书院考试者不论其具有秀才资格与否即予录取;其次,将考查学生学业的方式由开卷改为闭卷。莲池建书院自李铁梅先生以后,规矩皆为宽纵,如官斋两课,从来都是开卷考试,他认为此种开卷考试的方式,易致学生荒废学业、学风也流于空疏,于是,其在斋课日,“亲率提调,闭门坚试。”^[8]经过吴汝纶的躬亲实践、苦心经营,莲池书院始成为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使得畿辅人才盛甲于天下,取巍科登显仕者大都为莲池高第,而江浙川粤各省望风欲避,莫敢抗衡其声势。其中较为著名的门生有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文状元刘春霖、易象学家尚秉和、大儒高步碱、日本学者中岛裁之。此外,民国政坛的人物如“总统”冯国璋、工商总长谷钟秀、教育总长傅增湘、直隶省长刘若曾、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都曾就读于莲池,师从吴氏,故一时才智,多集其门上。

1902 年,当清政府的变法政策逐步得以实施之际,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前往日本考察学制。吴汝纶赴日考察受到日方的空前重视,他在访问期间,不仅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招待会,还受到天皇的破例接见。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的成果,一是由在日访问期间日方各种报纸报道编集成的《东游日报译编》,该书不仅报道了访日进程,还有日方官员、学者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建议以及吴汝纶本人的教育改革设想;二是由吴汝纶在归国前写就并经日本三省堂书店出版的访问报告书《东游丛录》。《东游丛录》分为四部分:一、文部听讲;二、摘抄日记;三、学校图表;四、函札笔谈。

三、以“文”化人,陶冶“性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民”的本义是上施下效,教行迁善,充分发挥“文”所具有“化入人心”的巨大力量,使人向善、求真、崇美。董仲舒曰:“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9]意即对民众广施教化是维系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之根本。陆贾,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在《新语·无为》中指

出：“故曰：尧舜之民，可北屋而封；桀纣之民，可北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显而易见，这些政治思想家都在强调教化的重要性，旨在说明运用文化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有利于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教化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国语·周语》说：“教，文之施也。”《说文》说：“化，教行也。”“化”之本义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悄然改变。从文字训诂来看，“化”从“人”从“匕”，《说文解字》说：“匕，变也，从到（倒）人”，“文化”中的“化”是动词，强调“以文化之”，以“文”化人，上有所教，下有所行，“在阳称变，在阴称化”，可谓之“化”。

桐城文人士大夫普遍认为，经由古代圣贤所提倡的社会倡导性价值规范具有普适性，通过以三纲八目为体系的学问道德来教化和规范人心，敦厚民俗，是实现理想政治、圣贤治政的主要途径。而“教化”一词，在古汉语中的另一说法是“陶冶”，“陶冶”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冶陶铸金工艺技术，即按照某种先行设定的模式，把将要塑造的泥坯置入熔炉的火中，使之在火中得以定形。《汉书·董仲舒传》曰：“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10]即以陶喻造瓦，冶以喻铸金，言天之生人与此类似，或曰陶冶发“性灵”。在桐城先贤看来，若只依靠政令、刑罚等具有强制性的措施来治理国家，民众虽然会服从统治，但不会心悦诚服，只有用良好的、具有普适意义的伦理道德去教化、引导民众，将这些伦理道德内化为广大民众自身的情感意志，使民众懂得礼义、廉耻及各种社会规范，他们才会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成为君主的忠臣与顺民，政权才能真正地得以稳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教化民众能取得用刑杀处罚等强制手段所难以取得的良性统治效果。从桐城教育者的教民实践来看，教民行为本身具有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可以说，这种思想是应属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华部分，即在今天亦有其值得批判继承的地方。

四、教化民众，以“德”谋“得”

桐城文化中的教化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思想为归依向民众传播圣贤成仁成圣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要求个人行为主体的德性达至一定的高度和境界，内圣的通路是外王，外王是受教之行为主体通过自身德性的修炼而获得的目标，体现在世俗性的行

为规范中即是行为主体的德行，亦即“得”。桐城文人士大夫极为推崇并发展了内圣外王之道，亦即德性与德行的倚联原理，这也是他们从教的主要内容之一。“德”“得”倚联相通的价值原理体现为以“德”谋“得”的“合理性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因果律的逻辑法则，“它建立起一种人的生物性需求与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价值追求亦即‘德’与‘得’之间的因果链接，这种行为主体的善恶诉求与其现实实际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联，此种道德逻辑法则不仅要求行为主体在实现其自身需求的满足过程中的行为的合理性，还追求在其时的社会及施治安民等政治参与活动中践履以‘德’谋‘得’的价值实得的合理性。民众接受教育的过程是一个自觉内化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社会倡导性价值规范为自身道德品质的过程，这种道德品质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并通过其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德行表现出来”^[11]。

关于如何内化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社会倡导性价值规范为自身道德品质，桐城仕宦认为须依托行为主体在知、情、意统一的基础上内化外在的社会倡导性价值规范，以此成就和完善自我的人格，形成高尚德性。“知”，就是指行为主体对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认识，是指受教行为主体对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认知。“情”，是指受教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社会思想道德原则、规范去理解、评判周围的人和事时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培育出行为主体的道德情感驱动力，使其对社会崇尚性或倡导性价值规范产生积极正向的认知评价和道德意志，从而建立起自我克制和防范抵御各种世俗性诱惑的自律机制，以杜绝各种因欲望诱惑而产生的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意”，是指行为主体在对事物进行认知和经过切身情感体验后产生的一种自觉克服困难和障碍的意志力。此种意志力是在受教行为主体经过内化社会崇尚性价值规范和体验道德情感基础上产生的，它能对行为主体因欲望而诱发的趋利性和自利性的个人任意性行为产生一种评价性的自我规约作用力，从而有效地抑制人的不合理的生物性欲望和控制自身的非理性的情绪冲动。因此，在受教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知、情、意三要素不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更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制约的。教化最重要的也是最特别的就是注重一个“化”字，从文字训诂来看，“化”从“人”从“匕”，“文化”中的“化”是动词，强调“以文化之”，以“文”化人，“化”就是要引发和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

因此,桐城文人士大夫提倡受教的行为主体须在知、情、意统一的基础上,将“国家所倡导的价值性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意志、信念,使其虽处不同境遇而终不改由自身高尚品质统领的向善的情感、倾善的行为,从而成就一种高尚道德自律的人格境界,使其在道德实践中构成了行为规范的一种强有力的

保证”^[12],从而为受教的施治官吏践履以民为本、泽及斯民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指引和价值规范上的规约,且还能够以他们的思想理论影响前来求学的年轻学子,这些学子今后或出仕,或教学,遂将桐城文化中的这种泽及斯民的民本思想扩展和传播到全国并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张元. 桐城文化中的爱民思想研究[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3(3):102.
- [2] 张元. 方东树的经世思想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3(10):164.
- [3] 姚莹. 朝议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衔从祖惜抱先生行状[M]//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252.
- [4] 张廷玉. 明史:选举志[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217.
-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二:汉纪二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322.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6:42-43.
- [7]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王才勇,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27.
- [8] 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三[M]. 合肥:黄山书社, 2002:644.
- [9] 董仲舒. 春秋繁露:精华[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139.
- [10] 班固. 汉书:董仲舒传[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1905.
- [11] 张元,赵保全. 以德得伦理倚联思想构建高校学生就业诚信体系[J]. 煤炭高等教育, 2016(3):54.
- [12] 张元,丁清,李晓宁. 网络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践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 2014(4):108.

Practical Wisdom of “Enlightenment” Thoughts in Tongcheng Culture

ZHANG Yuan

(School of Marxism,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cavate the ideology of “Enlightenment” in Tongcheng culture and provid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nutritional facto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Through analysis of Tongcheng culture of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it finds out the rule that governs the people, which in turn is the rule of the heart. It is better to teach people to do good than to issue good decrees. The specific forms include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 revitalization of education, supervision instruction, the initiative “education”, people with “culture”, “cultivating the personality”, educating people, and “acquiring things by means of virtues”. The main lectures, Renxian school teaching encyclical and the creation of academy and other ways can be adopted to teach the lower classes of folk education, enlighten and regulate the people with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he people’s ideological spirit. Therefore, the inner and emotional life of the people will change, who will understand the rituals, shame, and morality. A sustained and stable spirit of consciousness and behavior can help reach the core of Tongcheng culture.

Key words: Tongcheng culture; Enlightenment of thought; Enlightenment of people’s spirit

[责任编辑 夏强]